

國民黨黨史新論

王奇生，《黨員、黨權與黨爭——1924~1949年
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》
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3。377頁。

李里峰*

本書作者早年從事中國留學史研究，出版專著兩部。自1994年轉向國民黨史研究，先後以〈國民黨基層權力群體研究：以1927-1949年長江流域省份為中心〉和〈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和運行機制(1924-1949)〉為題，完成博士學位論文（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，1997）和博士後研究報告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，1999），並發表相關論文多篇，在學界引起很大迴響。本書即由作者博士後研究報告增補修訂而成。筆者拜讀之下，深感其視角獨特，觀點新穎，資料翔實，堪稱近年來大陸國民黨史研究中罕見的力作，因撰此文略作評介。

除序言和結論外，全書共13章，各章內容大致按時段排列，在各時段內則分專題進行論述。前三章論述1924年改組，到1927年清黨前國民黨的組織狀況。第一章從制度層面探討國民黨如何借鑒俄共組織模式，建立一套新的政黨體制。第二章論述改組後國民黨的社會構成和基層組織運作。第三章詳述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對相互關係的認知、表述，以及權勢易位的過程。

*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後研究人員

第四至第十章的論述時段為 1927 年清黨至 1937 年抗戰爆發，全書對此時期著墨最多。第四章探討清黨對國民黨自身的負面影響，以及國民黨從動員型革命黨向控制型執政黨蛻變過程中，階級支持力量的缺乏。第五章通過一起勞資糾紛個案，進一步印證這一結論。第六章考察國民黨執政初期的黨治結構，指出國民黨政權是一個「黨治為表、軍治為裏的獨裁政權」。第七章詳細描述了地方層級國民黨黨權日漸低落的狀況。第八章從政治錄用機制的角度，證明國民黨黨治其實是「黨義治國」，而非「黨員治國」。第九章以「黨的派系化」和「派系的黨化」兩種模式，論述戰前國民黨的派系之爭。第十章對戰前國民黨的黨員群體進行分析，認為它是一個黨力渙散、衰微和軟弱的執政黨。最後三章側重論述抗戰時期國民黨的體制調整和組織狀況。第十一章論述戰時國民黨的體制調整及黨權的進一步低落。第十二章考察戰時國民黨的組織狀況，認為其組織功能障礙並未清除，黨力並未強健。第十三章論述國民黨「六大」期間的派系紛爭，以及抗戰結束前後國民黨內部發起的「黨政革新運動」。

本書最核心的論點是，「一黨獨裁的政權亦有強弱之分」，國民黨是一個「弱勢獨裁政黨」，其「獨裁之心有餘，獨裁之力不足」。可惜此一核心論點沒有在書名上表現出來，以醒眉目。作者首先對改組後國民黨的社會構成和基層組織運作詳加探討，指出改組後國民黨的基本力量是一批「有些知識而又沒有充分知識」的邊緣知識青年，他們在強化國民黨黨勢的同時，也對黨構成新的政治參與壓力，影響和制約了國民黨的組織運作。在「中體俄用」的治黨策略下，國民黨僅襲用了俄共的組織形式，而未能得其組織內蘊，故改組後的國民黨絕不是一個組織嚴密、紀律嚴明的黨。鮑羅廷(Michael Borodin)一直被認為是國民黨改組的總工程師，照本書作者的結論，這位工程師顯然是失敗的。

國共兩黨在有關清黨歷史的書寫中，一方頌之為「護黨救國運動」，另一方譴之為「反革命政變」。兩者皆將目光聚焦於中共在這場運動中所受的

沉重打擊，而都甚少關注這場運動對國民黨自身的直接影響。本書將關注的視角轉向國民黨自身，發現國民黨在清黨過程中的自我創傷，幾乎不亞於共產黨所受的打擊。清黨之後，國民黨地方黨權託付無人，唯有聽任土豪劣紳和投機腐化分子侵奪和分掠地方權力資源，在地方社會藉黨為惡。爲了與共產黨劃清界線，國民黨的政綱政策和組織路線均不得不改弦易轍，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魅力因而蕩然無存。黨民關係由動員體制轉變爲控制體制，國民黨從此由一個有著廣泛群眾參與的動員型革命黨，蛻變爲一個以政治控制爲主的執政黨。直至抗戰前夕，國民黨的黨員數量尙未恢復到清黨前的規模，黨務組織形態呈現出「上層有黨，下層無黨；城市有黨，鄉村無黨；沿海有黨，內地無黨」的格局。

作者並質疑國民黨以黨治國、以黨治軍的說法。作者通過對國民黨黨政、黨軍關係的深入考察之後指出，在黨權與軍權的較量中，1924-1926年爲黨權支配軍政時期，1927-1931年爲黨權與軍權頡頏時期，1931年以後則爲軍權控扼黨政時期。蔣介石以軍權裹脅黨權所建立的獨裁政權，只是形式上仿擬蘇俄一黨專政體制，實則仍以蔣的軍治理念爲內涵（頁170-179）。作者還專門考察了國民黨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情形，指出在實際運作中，黨政之間爲爭奪權勢資源而時起衝突。國民黨中央傾向於將地方行政交由地方政府主控，黨權在地方政治運作中因而日趨弱化。加之戰前國民黨員對政治資源控制有限，國民黨最終只建立了一個脆弱的黨治國家秩序。抗戰時期蔣介石曾試圖調協黨政關係，黨員規模也得到了空前擴張，但黨權低落的格局並未改變，組織功能障礙和內在積弊並未清除，黨力亦並未強健和壯大。經過這樣層層推進的論述，兼與俄共和中共的比較，作者最終得出了國民黨爲一「弱勢獨裁政黨」的結論。此一結論也證實了一種說法：1930年代的蔣介石雖想以法西斯來集中權力，振興黨國，結果卻被外國人稱之爲「雜碎獨裁」(chopsuey dictator)。

本書另一引人注目之處，是對國民黨政權階級屬性的出色分析。作者指

出，國民黨既然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，就須迎合舊秩序中既得利益階級的需求；既然聲稱代表全民，就須同時兼顧被壓迫階級的利益。這使得國民黨時常陷於理論和行動之間互相矛盾的尷尬境地。在農村，國民黨不敢觸動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，極力維護舊的土地私有制；這種做法固然失去了廣大農民的擁護，卻「未必贏得了地主階級的歡心」。因為在地主看來，其土地是祖上遺留或自己購置，並非國民黨無償賜予的，故對其並不感激；國民黨執政後大量增加田賦，更使地主階級深懷不滿。在城市，國民黨雖力圖在勞資之間維持平衡，抑制和消弭勞資衝突，但是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終究是一種對抗關係，國民黨的調和努力常常導致「兩不討好」（頁 116-120）。作者並以 1930 年代初期的一起大規模勞資糾紛（「三友案」）為個案，細緻而生動地展示了工人、資本家和國民黨政權三者之間複雜而微妙的互動關係。這一個案充分表明，國民黨執政後雖一再聲稱代表全民利益，事實上卻沒有哪一個階級「真正認同或感覺到國民黨代表了他們的利益」。這種似乎左右逢迎、實則模稜兩可的政策，反使國民黨為各方所厭棄，動搖了堅實的社會階級基礎（頁 145-149）。

民國時期政治制度的法令條文與實際運作之間，往往存有相當大的差距；要探明歷史的真實面相，勢必要將目光從制度層面轉向運作層面。書中所論每一個重要問題，都同時兼顧到制度和運作兩個層面，而且鑒於以往相關研究重制度而輕運作的狀況，作者明確將重點放在後者。例如，第一章分析國民黨改組後的組織形態，側重制度層面的描述，予人以「具有群眾基礎的現代動員型政黨」之印象，似與以往看法大致雷同。但第二章隨即詳論這種組織體制的實際運作形態，出人意料地得出了與之完全相反的結論，即改組後的國民黨內聚力並未增強，組織形態依然散漫如故，這令人不得不重新評價和反思國民黨改組的意義和影響。又如第六章論戰前國民黨的黨治結構，先從制度層面分析中政會的法理地位，指出其作為「制度化的黨治輸入管道」的重要地位；進而考察其實際運作時，作者發現中政會的職能和地位

有一個「由實變虛」的過程（頁 155-157）。再對地方黨治以及黨權與軍權較量的實際情形詳加探討，得出國民黨黨治的法理序列應是黨→政→軍，而實際序列卻是軍→政→黨的有趣結論（頁 169）。

以上是制度與運作分途的實例，書中也不乏制度與運作相互印證的例子。例如，第四章對國民黨階級基礎的制度考察，已經顯示出國民黨階級調和政策的自相矛盾；第五章通過勞資糾紛個案的細緻展現，則更生動地加深和印證了這一結論。第七章論地方層級的黨政關係，先從制度上揭示黨政分開、黨部不准直接干預行政的基本原則；進而對地方黨政糾紛的實態詳加考察，進一步強化了地方黨權低落的結論。第八章論國民黨政權的政治錄用，同樣先闡明「黨義治國」而非「黨員治國」的制度，然後以入黨與入仕的實際關聯予以印證。在這些例子中，對運作層面的探討使相關結論更加確鑿、深刻和生動。

本書作者深諳比較分析之道。諸如通過對國民黨與俄共、中共的深入比較，作者意欲探究幾乎同時「以俄為師」的國共兩黨，在「治黨」與「黨治」體制方面的同與異。作者指出，在組織形態和政治文化方面，兩黨實具有「同源性」和「同構性」，但正是這種「同源性」和「同構性」蘊含著激烈的矛盾和對抗。作者並未停留於考察兩黨師俄之同，而是更著重探討兩黨師俄之異，認為國民黨雖然組織形式上以俄為師，而意識形態上卻排拒共產主義，結果只學到半套表面功夫，從而使自己陷於一系列的兩難困境：欲討全民歡心，反為全民厭棄；欲使黨政制衡，反致黨政傾軋；欲求以黨治國，卻成以軍治黨……因此，國民黨實際上是依據兩個不能同時並立的政治架構（俄共的黨治學說和西方民主政體的分權理論），「拼裝了一台不倫不類的政治機器」，這種雖兼收並蓄，卻未能兼收二者之長，反兼得二者之弊的後果，最終決定了國民黨的弱勢獨裁性格（頁 361）。

從書中論述來看，作者頗能借用歷史時期的話語，對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進行脈絡梳理和理論提升。如兩黨的歷史參與者都從各自的立場，來塑造

和表述 1924-1927 年間的國共關係，乃至在數十年後的今天，海峽兩岸學者的描述仍存有很大差距。作者敏銳地觀察到，這個時期國共兩黨關係一直處於動態變化之中，兩黨合作的形式、內容和表述，亦隨著兩黨力量對比的變化而改換。作者通過史料爬梳，從中勾勒出兩條基本線索：一是從「容共」到「聯共」（國共關係由主從到平等的轉換）；另一是從「容共」到「容國」（兩黨權勢易位，共產黨「反客為主」）（第三章）。這兩條線索的勾勒，突破了以往或「容共」或「聯共」各執一端的偏頗之見。「容共」、「聯共」、「容國」等概念皆出於當時的報刊言論，以之釐清這一段複雜歷史的基本線索，令人信服。

作者在蒐集史料、發現問題、再現歷史情景、探尋因果關係之間，對社會學、政治學等領域的一些理論和方法亦有所借鑒。例如，第五章對勞資糾紛的個案研究，筆者十分歎服其對工人行動策略的精彩分析。作者指出：工人在「三友案」中雖處於弱勢地位，卻並非完全扮演被動受壓的角色。他們採取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行動策略，將糾紛「鬧」大，將自己的生存困境推演到危及社會安定的程度，使政府無法推諉迴避。而與此同時，他們又自覺保持著模糊卻又無處不在的行動界限，即始終採取和平的「鬧事」方式，始終以孫中山「扶助農工」政策為理念訴求，從而儘可能使自己處於有利位置，而讓資方去承擔各種責任。筆者讀到此處，即刻聯想到政治人類學家斯科特(James C. Scott)關於「弱者的武器」的論述，以及傅柯(Michel Foucault)、布爾迪厄(Pierre Bourdieu)等人關於「行動者」和「策略」的理論。工人通過「鬧」大糾紛而「建構問題化」的具體策略，則與社會學者應星在《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——從「討個說法」到「擺平理順」》（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2001）一書中，對三峽庫區移民上訪策略的描述極為相似。在筆者看來，雖然全書新見疊出，但就閱讀的即時感受而言，當以此段論述最為精彩。

本書的基本觀點和創見，大體已如前述。但在閱讀過程中，筆者也對若

千問題有所存疑，在此不揣淺陋，提出來就正於作者與讀者。

關於黨、政、軍各系統人事關係的考察，是本書研究國民黨黨治之實際狀況的重要依據。作者將國民黨中央黨政軍的角色剝離開來，發現黨權「若無其他軍政實職相依託，便難免落空」，從而得出了黨權「附驥於政權和軍權之上」的結論（頁 164-165），這顯示出作者敏銳的洞察力。但在接下來論述地方層級的黨政關係時，作者爲了強調地方與中央的差別，又做出了與此相反的論斷：「在中央一級，黨的菁英不僅壟斷了決策權，也壟斷了執行其決策的黨、政、軍權力體系內的關鍵職位。」（頁 199）兩相比較，顯然前者才是作者的本意。同樣，第七章論述黨治在地方層級的運作時，已經充分證明了基層黨權的邊緣化。而在第九章分析派系之爭時，又出現了這樣的論斷：「在地方自治的名義下，縣黨部委員一般規定由本縣人擔任。這實際上給地方『菁英』們提供了一個覬覦和分掠國家權力資源的良機。地方菁英們爲了爭奪權力資源，大多分立門戶，互爭雄長。」（頁 216-217）從作者的描述來看，地方土著勢力滲入黨部、攘奪黨權、分立門戶，當屬實情。但是既然地方黨權本身已經如此低落，甚至軍隊和地方政府竟可擅自捕殺黨部人員（頁 197），那麼地方「菁英」對黨權的侵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分掠了國家權力資源呢？

書中多處引述蔣介石讚賞軍事而貶斥黨務的言論，但引述的目的不一，或以之作爲蔣重軍輕黨的證據（頁 173），或以之作爲軍權重於黨權這一客觀事實的依據（頁 178）。雖然主觀上的輕視黨務與客觀上的黨權低落密切關聯，但是對於蔣介石個人的身分歸屬，卻容易造成含混不清的印象：蔣究竟是作爲國民黨黨魁，致力於一黨專政（如頁 294 稱：「蔣不僅把政權視爲國民黨一黨所有，連民眾也要爲國民黨所獨控」，即視蔣爲國民黨利益和權力的忠實代表）；還是作爲軍事獨裁者，重軍而輕黨（尤其是第六章第二節，充分論述了蔣對軍權、軍治的迷戀和對黨權、黨治的輕視）？

由此出發，筆者對本書更重要的結論之一也不禁發生疑問，即國民黨究

竟在何種意義上是一個獨裁的黨？根據作者對國民黨作為弱勢獨裁政黨之性格特徵的描述，這種弱勢不僅取決於種種客觀條件的制約，也與國民黨人（尤其是作為黨魁的蔣介石）自身的取向密切相關。筆者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的印象是，國民黨不僅「獨裁之力不足」，甚或連「獨裁之心」也並非「有餘」（指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而非蔣介石的個人獨裁）。尤其書中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十一各章，展現給讀者的景象似乎是國民黨中央一直在自覺約束全黨，以防範黨權對行政的侵越（至於蔣介石本人，更站在其個人獨裁的立場上青睞軍治而輕忽黨治）。如作者所稱，國民黨一方面具有「黨天下」的意識（頁151），另一方面又秉承孫中山「黨義治國」而非「黨員治國」的遺訓（頁201-204）。這種缺乏制度支持而難免淪為空談的「黨義治國」，似乎很難說明國民黨的「獨裁之心」。在將國民黨定性為「弱勢獨裁政黨」時，作者的關注點全在「弱勢」一面，而對其「獨裁」卻似乎視為理所當然，而未加詳論，致使讀者難免心存疑慮。以筆者愚見，在做出國民黨以黨治國和一黨獨裁（即便是弱勢的黨治和獨裁）的論斷之前，必須對國民黨高層自覺約束黨權的態度和舉措，在邏輯上做出更明確、更深入的闡釋和說明，否則不宜遽下結論。（筆者注意到頁191有這樣一段話：「國民黨推行黨政分開的地方黨治體制，其間因素雖然複雜，但並非有意使其政治體制朝著民主政治的方向邁進。只是它始料未及的是，正是這種黨政分開的地方黨治體制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民黨的黨治權威和黨治基礎。」這似乎表明，作者已經意識到國民黨「一黨獨裁」的論斷與「黨政分開的地方黨治體制」之間存在邏輯上的矛盾，但作者並未對此做出合理解釋，僅將其說成是國民黨的「始料未及」，似難令人信服。）

全書佈局亦有不均衡之處。戰時及戰後國民黨的組織形態，在時間上近佔全書考察時段的一半，而論述篇幅卻不足全書四分之一。尤其是戰後階段，除最後一章「黨政革新運動」有所涉及外，幾乎置而不論。儘管作者認為「國民黨的危機在其執掌全國政權之初即已展露無遺」（頁275），但不可否認

兩黨絕對實力的逆轉，發生在戰後決戰時期。這一時期相關問題的探討付之闕如，顯然有損全書內容的完整性，讓人讀罷全書而感意猶未盡。全書資料雖搜羅極廣，但作為研究國民黨史之學術專著，而未能利用台灣業已開放的相關檔案史料，亦是一大遺憾和缺失。

不過，總的看來，上述缺憾絕不足以掩蓋本書的重要價值。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具體論斷，無論為學界贊同或反對，他在史學方法與解釋上獨具特色的研究成果，無疑是今後有志於研究國民黨黨史者，所無法漠視的。